

大家精要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慧远

蒋海怒◎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慧远 / 蒋海怒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735-6

I. 慧… II. 蒋… III. 慧远(334~416)—传记 IV.
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984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易 山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慧远

HUIYUAN

蒋海怒◎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735-6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第1章 儒门寒士 游学求道 ————— 001

雁门僧 ————— 002

游学许落 ————— 004

时代思想文化气象 ————— 007

第2章 师徒因缘 委命受业 ————— 016

结缘道安 ————— 017

辗转弘法 ————— 024

辩才无碍 ————— 029

第3章 栖止匡庐 东林弘法 ————— 033

托迹东林寺 ————— 034

庐山教团 ————— 040

坐禅、诵经、劝化 ————— 048

第4章 群英荟萃 不敬王者 ————— 051

名士和隐士 ————— 052



002

对峙王权	057
沙门不敬王	061
关于衣服的争论	066

第5章 江山虽邈 理契则邻 069

神交鸠摩罗什	070
刘遗民与僧肇	078
襄助佛典翻译	080

第6章 平章华梵 巍然成宗 088

宗本法性 形尽神存	089
三报相催 险趣难拔	102
念佛三昧 往生净土	115
三教论衡 异轨同趋	125

第7章 声高名远 千载垂光 139

哲人其萎	139
佛门的天下宗师	143
文化会通的巨匠	148
慧远与庐山文化	150

附

年谱	153
主要著作	155
参考书目	155

第 1 章

儒门寒士 游学求道

在我国的名山大川中，庐山以其清幽深邃的独特魅力而为古代文人学士所喜爱，它也是那些厌倦红尘的隐士所向往的“嘉遁”之山，它的隐逸文化气质也熏染和造就了很多怀抱自由意志的文化人。古谚有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东晋时期的佛教高僧慧远受庐山的感召而栖止此山，其高远人格形象也给庐山增添了另一重魅力，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人们提及庐山，大多谈及慧远。在中国文化史上，慧远和庐山已经连成一体。所以人们将其与庐山连称——庐山慧远。唐代诗人孟浩然即有如下千古名句：“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这里的“远公”，就是对慧远的敬称。然而，虽然慧远在庐山生活长达33年之久，但他并非庐山当地人，甚至也不是南方人，而是来自雁北的一名地道的“北人”。对于他这段纵贯南北中国的经历，人们用“翻飞朔野，栖息南山”，“江东龙藏，悉本雁门”，“雁门上人，创迹庐阜”这类语句来加以

描述。

雁门僧

公元334年出生的慧远，恰逢一个苦难的“五胡乱华”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祸和天灾交替而至，平民百姓朝不保夕。其时，西晋王朝南渡，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王朝的建立，本来是“三国之乱”后的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但由于“八王之乱”，朝纲紊乱，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侵掠汉族聚居区域，更加导致了“丧乱弥甚”的状况。慧远出生之时，正值少数民族羯族所创立的后赵国统治时期，并且从其出生一直到栖止庐山精舍，一共经历了前秦、后秦等少数民族“王朝”，见闻了石弘、石虎、苻坚等数代王朝政治。这些王朝的国君，或庸碌无为，或残忍暴虐，或狂妄自大，没有一位符合儒家圣明君主形象。可以说，慧远对当时北方的上层统治者是非常厌恶的，他也从未计划走“学而优则仕”这一古代知识分子的老路。除了政治的混乱，自然灾害也时常出现。据史书记载，当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慧远的家乡并州经常出现蝗灾和饥谨，“草木和牛马毛皆尽”，人多饥乏，以致于鬻卖人口，寇贼流行，百姓又被流寇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真是一幅乱世景象！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普通百姓朝不保夕，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经济上也非常困难。这无疑对少年时代的慧远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对人世的“无常”有深入骨髓的切身感受。

慧远出生之地为并州雁门郡楼烦县（今山西省原平市崞阳镇）。雁门，在中国文化记忆里，总是和战争、边境、险隘、胡人、严寒和荒凉联系在一起的。的确，从战国时期的赵国以来，雁门一直处于汉族聚居区域的边缘，也是胡人马蹄经常践踏的地方。慧远在此出生，其身世无疑也挟带了某种悲凉的色彩。如果我们到今天的崞阳镇，还能看到楼烦寺——它是为纪念慧远出生于此而建造的。这楼烦寺的存在表明虽然慧远所处的时期“代远难稽”，人们对其早年生活所知甚少，但是他依然受到当地百姓的纪念和崇敬。慧远的尊称有很多，为人使用最多的是“远公”，“雁门僧”、“楼烦大士”也是其中的两个。如唐代诗人杜牧即有“歌惭渔浦客，诗学雁门僧”之句，唐代诗僧灵澈《远公墓》诗亦云：“空悲虎溪月，不见雁门僧。”到了宋代，诗僧怀悟亦将慧远“白莲结社”的情景描述为“楼烦大士麾麈尾，十七高贤争扣几”。这都是用出生地指代慧远。

关于慧远的家世，我们无法获得让人满意的信息。由于慧远是一个出家人，而出家人都以佛门为归宿，所以通常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身世，慧远也是如此。关于他的家庭状况，仅在《高僧传》中有“本姓贾氏，世为冠族”这样简单的八个字。“冠族”是一个身份象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非常流行，人人都羡慕生于高门贵族的家庭，有一个冠族家庭背景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此外，家道的殷实也使得慧远后来不必在红尘世界中辗转求生，进而使得他皈依佛门成为可能。根据仅有的史料记载加上合理的推测，我们认为，慧远家族知识背景优异，是个书香门第。此外，慧远的父亲姓贾，是一位博通儒

家经典的儒者。母令狐氏，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慧远还有一个弟弟，这就是后来与慧远一起出家的慧持，他也是一位好学的书生。慧远有一个舅父，后来慧远和慧持曾经跟随这位舅父到一些大都市去学习。因而，在上述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青年时期的慧远毫不费力地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了。

游学许落

身处这个战争和灾患交替的动乱时代，少年时代的慧远履行着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本分——刻苦学习。史载他“弱而好书，珪璋秀发”，显然是一个聪颖出众的青年书生形象。后赵的统治者石虎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征服者，但是他深知治国之道首在教化的道理，再加上他又非常崇敬汉族文化，于是在他的号召下，整个国家都提倡儒家经典的研究。在这种崇尚儒学的氛围中，慧远为了得到更多的文化知识，遂在13岁那年与弟弟一起随同舅舅令狐氏离家访学，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河南洛阳、许昌学习，钻研儒家经典。许洛位处中原核心地区，浸润着两汉魏晋以来思想文化的流风余韵，也是当时两大学术思潮“经学”和“玄学”的集中地。慧远身处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自然所获良多，加上他的博学和聪慧，很快就脱颖而出。史料记载，当时很多学识渊博的“宿儒”和前辈“先进”都非常叹服慧远极强的理解能力。至于具体的学习内容，根据他的传记中“博综六经，尤善庄老”的描述，我们得知慧远对儒家的“五经”以及道家《庄子》和《老子》皆有超越群伦的领

悟能力。我们还注意到，此时的慧远逐渐显露了“名士风度”。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一直主张“为人”与“为学”的统一，所以当时人们非常重视对“人”的认识，也流传着很多专门论述人的气质形象的篇章，时称“品藻人物”。这些论述侧重对人物的气象、风骨的勾勒，及对人物行事特征的描述。例如，就慧远而言，时人是这样加以鉴赏的：少年时“弱而好书，珪璋秀发”，成年的时候则“性度弘博，风鉴朗拔”，就是说其气度博大宏伟，风骨高洁。当其学佛之时，则“神明英越，机鉴遐深”。这几乎是当时对“名士”最高的评价了。

许洛游学的经历带给慧远深刻的思想，也使他对人间事务有了更真切体验。一方面，慧远发现，自己从儒家经书所习得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政治的腐败和虚伪有着非常严重的冲突，儒家之道被当作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束缚精神的牢笼。前面说过，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后赵的统治者石虎致力于推广儒家思想，号召用“六经”治国。但是这种口号在更多情况下仅仅停留在标榜的层面，在实际治国过程中，他却穷奢极侈，劳役繁兴，畚鍤相寻，干戈不息，刑政严酷，老百姓动见诛夷。百姓心中充满着恐惧，却又无处求取哀怜。统治者言行的极度反差和老百姓的艰难困苦，使得身处其境的慧远非常忧愤，同时也使他对儒家政治原则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另外一方面，当他接触了老庄道家时，就觉得他们对儒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从而判定儒家的政治道德学说是“不切实用的虚谈”。庄子和老子是作为儒家的批评者形象出现的，在他们的书中有大量针对儒家虚伪的仁义、繁琐的仪礼和扭曲的人性的

批评，这些无疑很对慧远的胃口，所以他才“尤善庄、老”。在实际行动上，对儒家理想的遗弃和对道家思想的推崇促使青年时代的慧远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定当一名隐士，这一年他 21 岁，刚过了弱冠之年。按照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传统，男子 20 岁需要行冠礼。行了冠礼标志着男子已经成年，必须开始履行一个成年男性的义务。但是因为慧远怀有上述理念，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融入那浑浊的人世。于是他决定追随时声名远闻的隐士范宣子隐居。范宣子从小志向高洁，信奉儒家仁孝忠义的道德哲学。据说范宣子的亲人去世后，他自己负土成坟，在亲人的墓旁搭起茅棚居住了很多年。此外，他看到当时官场的腐败，就决定不走仕途，不入“公门”。传说有一次他与另外一位大名士韩康伯一同乘车，在到达官府大门的时候，韩康伯试图引诱他进官府里，结果范宣子从车的后面跳下来，径自离开。由于范宣子不甘心随波逐流，所以他经常陷入饥贫之中，“闲居屡空”。即使如此，范宣子依然“以讲颂为业”，并且对儒家深奥的“三礼”之学有独到而精深的见解。由于他“少尚隐遁”，并且具备了孔子所说的“退而求其志”、“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精神，一些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闻名而来，久而久之，范宣子的大名传播到大江南北。慧远从他人那里听到了范宣子的事迹，对其志向颇为景仰，更觉得志同道合，于是萌生了与范宣子“共契嘉遁”的美好想法，遂打算从黄河以北地区赶赴范宣子隐居的“江东”。可惜的是，后赵统治者石虎死亡，导致各路地方政权争权夺利，北方陷入连年的战乱之中，通往南方的

道路也被阻塞。慧远与范宣子结庐江东，“共契嘉遁”的目标无法达到。

时代思想文化气象

慧远身处的后赵国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是由于大多数国民是汉族，因此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后赵与当时退守在南方的东晋都属于同一个“文化中国”。在此“文化中国”范围内，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融合、思想大解放、文化大交流的趋势。国家不兴诗家兴，政治的分裂和政权的更迭也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就时代思想文化气象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儒佛道三种思想体系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二是综汇魏晋玄学成了当时的学术形态；三是佛教逐渐占据了时代思潮的首位，在玄学内部，也出现了从儒道玄学向佛教玄学的转换趋势。慧远的先习儒，“博综六经”；后习道，“尤善庄老”；最后归宗佛门，将当时的儒道二家视为谷糠，所谓“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这种学问宗旨的改换不仅反映了慧远个人思想的不断前进，也与此时的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线路相吻合。

在东晋时代，儒学精神虽然已经遭遇困厄，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依然不容忽视。我国古代的书生自幼年开始就要诵习儒家经典，在两汉时期，他们诵习的经典主要是“六经”。六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古代的典章制度，也有民间的诗歌；既有人们的交往礼仪，也有编年史，还有古代的占卜书，例如

《易经》。通过这些经典的学习和背诵，书生们就可以获得古代政治、伦理、哲学方面的知识。汉魏之际，由于东汉国力衰微，儒学所依附的礼教秩序受到冲击，经学传统也无法延续下去。在当时的社会上，儒生的形象也一落千丈，人们把儒生描绘成僵硬地遵循那些不合时宜的礼法规矩，虽然口头上大谈道德，实际上却干着蝇营狗苟的事情的人。社会上流传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时人对儒生的讥讽。慧远的“弃儒”抉择必是有见于经学的琐碎或妖妄，同时也来自他对当时儒家礼教传统的虚伪本性的洞见。

道家之学是东晋时代另一派重要的思想传统。在魏晋时期，人们对两汉今古文经学传统非常不满，道家文化趁势而兴，老庄的“崇尚自然”精神得到极大的弘扬。当时一些学者发明了用老子、庄子的思想来理解儒家思想的趋向，如王弼以《道德经》解释《易经》和《论语》。但是到了后来，知识分子思想中的老庄思想成分愈来愈重，当时有一部分激烈的思想家如嵇康和阮籍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嗜酒狂放，蔑弃礼教。慧远思想的第一次转折即是从儒学转向道家。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儒家的精神本质上是现实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这个视角出发，儒者对于探讨那些超越此世的、纯粹思辨的和非伦理的知识话题不是很感兴趣，这也造成了他们对于哲学思辨的厌倦。与儒家相反，道家的思维方式恰好是哲学的、超越性的和非伦理化的。老子曾经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

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此，“玄”代表着世界的“深层”、“本质”。因此，道家的思维方式是本体论的，它的探讨对象是世界的本体、本质。因此可以说，道家的探讨方式是“非经验的”和“超越的”。此外，我们需要区别魏晋时期的道家 and 道教。与侧重哲理探讨的道家不同，道教更具有民间宗教的色彩。道教的创始人是东汉末年的张道陵，他倡导五斗米道。道教思想来源驳杂，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巫术传统和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后来又融合阴阳五行、谶纬、咒术等内容，最后形成了道教思想系统。在当时社会上，道教的地位很低，通常被人称为“鬼道”。同时由于道教主张“符水治病”，所以被知识分子视为民间的鄙俗小道。慧远所学习的是道家之学，而非道教。他对于老庄道家哲理有深入的体会，史载他在后来公开说法的时候曾使用道家术语来解释佛教义理，并且在佛学著述中大量使用道家概念。这个事实表明他青年时代“尤善庄、老”的传闻并非虚言。

继而，东晋以后佛教兴盛逐渐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兴趣，他们对于道家的嗜好随之转移到佛教上面来。东晋时代思想文化气象的最重要的变化，乃是佛教跃居思潮先锋。该局面的产生，自然导源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兴盛。然而早期中国佛教并非直接来自印度，而是通过西域传来。关于佛教的传入，还有一个传说，据史书记载，东汉初年的汉明帝永平七年（64）的一天，明帝在晚间的梦境中看到一位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第二天，明帝就向大臣询问此神的来历。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天竺有叫“佛”的得道之神人，皇上可能是梦见佛

了。于是明帝派人西去讨求。这一行人过天山、越葱岭，在西域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内）遇到天竺沙门摄摩腾与竺法兰，就邀请二位来中国。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于东汉永平十年一起回到京都洛阳。明帝敕令他们在一个精舍中居住，这就是白马寺。所以佛教传入也叫做“白马西来”。佛教的输入源头主要包括大月氏、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从这些国家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法僧有安世高、支谶、康僧会、支谦等人。通过佛教的译经和传法活动，中印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成为现实。这也使得文化思想领域产生由道家精神向佛教精神转换的趋势。这种转换也有大众心理的根源，因为在当时，由于中原地区连年的战火和灾荒，在普通人的心灵里，道家的虚无精神无法给它的信仰者提供“解脱之道”，无法消除他们心中的“苦感”，也无法给人提供死后归趣的“终极关怀”。正是在这种理论的苦闷情形下，佛教尤其是其中的般若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产生了共鸣。

佛教就其字面含义而言，是“成佛之教”或“佛陀之教”。佛教的理论博大精深，派别众多，但是都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这三种精神，又称“三法印”（佛教的三种根本的标志）。涅槃寂静是描述佛教最高修证境界的清静状态。也就是说，一旦人们认识到世界和人生的不可持久和无自性的本质，那么就不会对世俗的事物产生执着，而走向对涅槃境界的追求，最后脱离苦难的因果轮回。就人生问题而言，佛教试图通过对人的肉体的否定（人无我）来说明它的缘起性空的本质，如《圆觉经》中所说：“我今此身，四大和

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当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就世界万法而言，佛教试图通过对诸法无有实体的说明（法无我）来说明其缘起性空的本质，如《中论·观四谛品》所言：“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三法印”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此外佛教还有很多的观念，如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六度等。

可以看出，相比于玄学而言，佛教提供了一整套的对生命方向的思考，从各种角度剖析人生，既指出了人生之虚妄，也指明了超越的途径。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佛教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观念使他们接受一种因“赏善罚恶”而“趋善避恶”的生活信念，通过不断的善行来改变或改良自己的命运。可见，佛教思想对中土民众有极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被后来的学者描绘为“佛教征服中国”。就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而言，佛教的两种形态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这就是般若学和禅学。就般若学而言，其中的关键概念是“缘起性空”。缘起观认为一切诸法（事物），皆因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立，因种种因缘消逝而消失，整个世界都存在于这种因果的链条之中，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此每个事物都没有固定的本质和支撑其恒久存在的条件，因而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性空”。整个世界和

俗世的人生无非是虚妄的“假有”，如同昨夜之梦、水上泡影、晨曦之露一样。显然，般若学在某些方面和道家思想有接近之处，如般若学的“空”在思想类型上接近于老子的“无”，般若学的“涅槃”、“寂灭”很类似于庄子的“无为”。这一点也反映在佛经翻译中，例如当时还有一些翻译家用“本无”来翻译佛教的“真如”。这些类似点都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沟通奠定了基础。禅学是另外一种佛学思潮。“禅”这个概念，乃梵文单词 dhyāna 的修饰性转写，本义是“弃恶”，后来被描述为“静虑”、“思维修”（思维而修得之）。也就是说，“禅”是佛教修行者通过精神修持获得觉悟、体证真理的方式，在修禅的时候要保持内心平静，摆脱外界的干扰。“打坐”（坐禅）是禅修习的最主要的方式。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这种佛教特有的修行方式吸引了中土人士的注意力。因此，“禅”也是中国佛学最早期的形态。当时中国人还认为，“修禅”是获得神通的重要途径。这是东晋时代佛教思想的一般状况。

东晋时代的哲学思潮是魏晋玄学，进行群体性玄学探讨的方式即“清谈”或“玄谈”。就总体思想流变而言，魏晋玄学起源于对两汉经学的反动，它主张用《老子》、《庄子》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和义理，所以又称“新道家”或“新儒家”。由于当时的佛教般若学的输入和传播，魏晋玄学又最终走向了佛学。具体而言，汉末两晋时期，由于知识分子对经学传统的反感，以及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失望，就转而寻找新的“安顿生命”的方法，他们吸收了道家思想的优势，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或评点